

[秘 鲁] 费尔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 著
竹碧 腊梅 译 段继承 黄志良 校



禁 制 之 夢

契约华工在秘鲁的命运



沙国之梦

——契约华工在秘鲁的命运

En el País de las Colinas de Arena

费尔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格兰达 著

Fernando de Trazegnies Granda

竹 碧 腊 梅 译
段继承 黄志良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国之梦：契约华工在秘鲁的命运 / (秘鲁) 德特拉塞格涅斯 (F. Trazegnies) 著；竹碧等译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ISBN 7-5012-1182-5

I . 沙… II . 德… III . 纪实小说-秘鲁-现代
IV . 1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0294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 - 1999 - 1478

书名题签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书 名

任景玉 (中国驻秘鲁大使)

程 立

段来和

林 琦

余 岚

沙国之梦——契约华工在秘鲁的命运

Shaguo zhi Meng——Qi Yue Hua Gong Zai Mi Lu De Ming Yun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排版印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100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3 插页：2

312000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和女儿们：

安娜·特雷莎，纳塔利、朱莉和卡罗琳。
我欠她们的太多太多，尤其是安娜·特雷莎，是她教会了我生与死。

和夫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
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老子

一九九三年 秋

於北京利瑪

唐正書



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老子》

19世纪中叶,秘鲁人怜悯在沿海谷地种植棉花和甘蔗、过着地狱般生活的黑人,解放了他们,转而引进中国人来替代黑人劳动力,仍在沿海谷地种植棉花和甘蔗,这些人同样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中国人什么都做,
从挖运鸟粪,
到山沟种地;
从手工粗活,
到清扫大街。

甚至给平民当佣人,
没有一项工作,
他们不能胜任。
—那这个国家的人呢?
—他们都想着做大爷!

——胡安·德阿罗那

这里安息着马农戈
纯种的拉丁人:
其母来自刚果,
其父生在中国。

——曼努埃尔·冈萨莱斯·普拉达

某些事件 不容避违
历史原貌 忠实记录
掩卷长思 不勘回首
汗颜面对 原始恐惧

——T.S. 埃利奥特

这里（中国）的新闻媒体大肆转载了利马报纸最近报道的关于中国苦力移民的消息，称之为“彻头彻尾的奴隶制”、“贩卖人肉”、“人类最羞耻的颓废”等等，还有那些假仁慈者用来造舆论的夸大之词。我认为，与其政府忙于制止以上危害，如已向这个国家派出外交使节，不如对我们的弱点保持沉默，至少将这一争论保留到以后更久远的年代，如此对国家更为有利。

——首任秘鲁驻华特使和全权公使
奥雷略·加西亚·加西亚

献 词

本书献给中国人，献给那些沉默寡言的人们。他们离开花的国度，远涉重洋，来到秘鲁的荒芜海岸，期盼过上好日子，可他们在这里却遭受压迫和凌辱，为的是别人——我们秘鲁人过上好日子。

我还想将此书献给黑人、印地安人、犹太人。总之，要献给那些为了别人胜过自己而受尽剥削或遭人白眼的所有种族。事实上，被社会贬低的许多人，与那些颇有优越感的人相比，其精神世界更加自由，其灵魂深处更加高尚。那些人的高尚不是靠自身的成长能力，而是依靠把侏儒的可笑外表给了别人，从而达到自己是巨人的感觉。

我不认为人是一样的：有出类拔萃的人。但是，差别在于精神的自由、创造性以及像雄鹰展翅翱翔的本领，而不在于肤色、出生地，也不在于出身卑微及其所谓的无知。

谁也不要靠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而应该帮助别人超越自我，再通过努力去超过别人。只有当大家都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其潜能时才会发现真正的差别。

鸣谢

我应该感谢的人很多，他们想方设法帮助我写这本书。我怕提及他们，因为我想难免会有遗漏。然而，即便会有遗漏，也请允许我向以下人士和单位深表谢意。

首先，我不能不强调我从几届学生那里所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在天主教大学听过我的秘鲁法学史讲课。虽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我要说，我把写书计划告诉他们并建议他们就某个方面进行调查时，他们都欣然同意。他们到布满蜘蛛与虫蛾的地方查阅档案，发现过很好的资料，做了大量工作。总之，他们向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观点。其中，我要特别提到法学史系教授雷内·奥尔蒂斯·卡瓦列罗，他后来执教秘鲁法学史课程，曾鼓励他的学生们为继续支持我写书而进行了其他的调研。贝特斯·雷卡瓦伦怀着喜悦和激情，负责准备了极为有用的有关中国移民法律法规汇编。我还想提及我的史学助教阿尔弗雷多·塔皮亚；还有阿曼多·格瓦拉，他俩竭尽全力搜集散失在旧杂志里的材料和文章。在许多年之后，阿曼多·格瓦拉还从他攻读人类学硕士的威斯康星大学继续给我寄相关的材料。

特别感谢我的女儿纳塔利，当时她还是天主教大学历史系学生，她同意先行展开历史调研，翻译了一些小册子，搜集了作为本书故事情节主要时段的上个世纪的有关报刊资料。

怎么能不提到温贝托·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呢？或许他称得上是秘鲁对 19 世纪中国移民问题研究最深的人，是他一开始就鼓励我写成此书。温贝托·罗德里格斯·帕斯托不仅提供了资料和建议、调查卡片和述评，而且，本书第一部分的几位人物也是他的研究成果。我还应当感谢本课题的另一位权威人士，伊萨贝尔·劳森特，他在一次旅秘时和我谈了一次话，给了我一本关于中国移民如何融入秘鲁社会并为秘鲁发展作出贡献的书，这些资料很有意义。

奥雷略·加西亚·加西亚先生是位杰出的外交家。在他的努力下，秘中两国开始了外交关系，并中止了拐卖中国苦力。弗朗西斯科·莫雷拉·加西亚和迪戈·加西亚·萨扬，是这位外交家的两个尊孙，他俩特别慷慨，把家里收藏的极有价值的文书材料给了我。弗朗西斯科·莫雷拉给了我一本秘鲁公使致曼努埃尔·帕尔多总统先生的私人信函复印件——他尊祖父把这封信集叫作“总统和朋友”，讲的是这位老外交家向帕尔多总统详细陈述其履行驻外使命的过程。迪戈·加西亚·萨扬把奥雷略先生与外交部往来的所有函件的复印件给了我。

威利·蒂尔曼斯，比利时驻秘大使，他向我讲述了中国劳工契约和英国劳动契约的重要联系。华盛顿—科文顿 & 柏林律师协会的菲利普斯·斯坦伯里，他让我看了有关书籍。

研究员纳尔希斯·托雷斯凭着聪明、热情和勤奋，在秘鲁外交部和其他档案中找到了大量此书已经采用的材料。豪尔赫·加尔维斯·马克斯找到了关于“玛利亚·路斯案”仲裁的要件，并对其作了很好的研究。阿莉西亚·尼科利尼则特别诚恳，他常年累月为我搜集《商报》“上个世纪的今天”专栏刊登的有关 19 世纪华人移民的新闻资料。该栏目作者埃克托·洛佩斯·马丁内斯多次

让我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 19 世纪纪事，并为我搞到了曾与奥雷略·加西亚·加西亚在谈判桌上交过手的中国外交大臣李鸿章的珍贵照片——遗憾的是当时秘鲁因为剥削中国移民在亚洲的形象很糟糕，还有在中国垂帘听政的皇后慈禧太后（西方人称她为“老佛爷”）的照片。中国苦力移民始于慈禧听政时期。收藏家温贝托·库拉里诺·卡梅雷热情地向我提供了一些上个世纪中国人的玻璃照相底片。人民历史研究和出版中心也给了我一些有趣的照片。

另外，还有几位人士给了我整本书的复印件，这些书在外国出版，所剩无几，而且只有在其他国家的大学图书馆里才能查阅得到。其中我要感谢罗伯托·保利内·达尼诺、路易斯·罗西塔·张、辛蒂亚·麦克林托克（乔治·华盛顿大学女教授）、路易斯·罗梅罗（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教授），他们怀着为我十分敬重的一份爱心，毅然寻找所需书籍并进行复印。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保利内·达尼诺，他亲手复印了一本关于大清帝国时期中国法律的重要书籍，全书共 600 页。

特别向为我这次文学创作提供了支持的中国血统朋友们致以谢意。天主教大学校长秘书萨拉·杨女士为我了解有关在秘华人情况进行了极为重要的牵线搭桥工作。阿尔韦托·张，当今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员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为我翻译了一封在国家档案馆查到的中文信。《东方月报》杂志编辑卡洛斯·阿卡特·科奇，为我提供了无法从别处搞到的关于中国风俗习惯的资料。费利克斯·唐使我得以通过象形文字的诠释体察中国人的精细，他允许我在他为其第十代孙子写的一本家谱中引用部分内容，并慷慨地把出现在本书开头的书法作品赠送给我，作品内容是《老子》中关于遵守契约的话。

我该把费尔南·阿莱萨当作华人朋友吧？差不多，因为他无疑是被收养的华人。他为我把契约的中文文本译成西文。

主要有 5 家单位参与了此项工作，我要感谢它们提供的方便。这些单位是：我的母校秘鲁天主教大学、国家档案馆、外交部、国家图书馆和《商报》。

最后，我要感谢令我难以忘怀的妻子安娜·特雷莎，尽管她已不在人世，但我相信她在天堂仍将关心着我的志向、我的热忱以及我的女儿们：纳塔利、朱莉、卡罗琳。我要感谢她们的耐心和理解，她们多年来每天都和我一起承受我的“华人故事”，天伦之乐的大量时光被我挤占用来撰写此书。

序 言

本书试图站在时代之肩窥视昔日的一个年代，我们想忘掉但每当我们认真回顾却又无情地存在着的一个时代。有记载并用于教育青年的官方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清清爽白的民族演义史，书中的一举一动都将关乎祖国的崇高形象。这一历史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它为我们有心“做秘鲁人”提供安全感和信任感。然而，我们非常担心，所有这一切不能成为我们民族理念的稳固基础。因为，试图隐瞒的东西，还有可能公诸于世，那时，马上就会招来文化的和政治的极端主义的怀疑、冷言冷语和别有用心。

另外，讲到国家利益，我们想起一种提法：对我国的弱点保持沉默更加显得爱国，至少要保留争论到未来更久远的一个年代。而今这个年代已经到来。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扬帆起航，毫无保留地看待我们的历史。承认历史就是历史。用激励我们的东西振奋精神，但不以为我所嫌弃的东西自欺欺人。现实形势要求秘鲁精神应具备坚实基础，这些基础不会通过藏匿于地毯之下而获得，而是要通过清扫我们历史之门户，使之通风良好来求得。总之，要发挥马塞拉称谓的历史的清洁功能。

如果我想这样写历史，仅有冷静和理智的回忆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创造历史（借路易斯·德贡戈拉·阿戈特的话说），“热情再热情，回忆再回忆，痛苦再痛苦”。

在1848年至1874年间，秘鲁从中国引进了约10万劳工到鸟粪岛上做工和修建铁路，但大部分在沿海谷地种植棉花和甘蔗。

有人对这些移民说，秘鲁是个“金山之国”，他们幻想在这片乐土上能获得幸福、变得富有，但来到秘鲁以后，见到的只是一座座沙丘，等待他们的却是灾难与残暴。尽管这次移民是根据一个有期限的劳工契约进行的，而且当时奴隶制度已被废除，但是，这些人通常还是被当作可买卖的物品一样来使用，或者说像牲畜一样地用来干活。合约期满后，很少有人回到中国，不少人在履行契约期间就已经死去，还有很多人留了下来，为秘鲁的发展贡献他们的勤劳和智慧。

现今的秘鲁及今天的秘鲁人，都带着这些苦难的人们的印迹和记忆，它曾是我们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绝不是“别人”的过去，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要把华人看成别人，或者把他们当作某种纯科学研究的好奇对象来议论他们，在秘华人的生活告诉我们重要的有关普通秘鲁人的生活。而且，归根到底，历史都是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的能力和弱点，人的事迹和犯罪的研究。由此，历史总是涉及到人，也就是说，华人也好，不是华人也好，历史学者或者历史题材中的人物也好，都是人。因此，对任何时期任何文化的不光彩事件的激动人心的发现，都会使每个人不寒而栗，如同原始的恐惧一般。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是面对着自身的不光彩行为。

本书在有关法律资料的帮助下，试图通过披露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直视这段令人愧疚不安的经历，对法律的社会职能进行反思。要求法律深刻反省并强迫法律披露其自身，展示其最隐蔽的秘密，而远不是只展示那些叫人怜悯和有其自身目的的表面现象。

法律方面来源——司法文件、法规、行政文书，涉及这些移民的有关法律关系的研究——为更好地理解秘鲁的这一国家轶事提供了大量资料。现在的人们的“良知”不太理会我们的历史课本中的这一国家轶事，正如当时费利克斯·西普里亚尼·科罗内尔·塞加拉所说的，“这是一块否定我们特征的斑点，一块我国法

律不容存在的污点”。

本书用纪实小说的形式讲述了 19 世纪中国劳工在秘鲁的生活。主人公是虚构的，但所发生的一切，却确实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某个华工身上，其故事情节是绝对可信的。书中开头这部分叙述，杜撰与事实并存：所谓杜撰是知道以什么为依据的杜撰，正如巴尔加斯·略萨所说，是知道原因的杜撰，是以文件和资料为佐证的杜撰。但这也是背景真实性的确立，不是具体指每个人物或每个事件，而是与这些人物所处的社会空间有关。书中所有情节，具体的人或事，或多或少都带有虚构的色彩。但同时我们可以说（如博尔赫斯所言），除了几个名字、若干地点和时间以外，其他全是真实的。

小说形式所营造的环境是乏味的资料所不能获得的，这不是歪曲事实，而是使之更为真实。尽管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虚构是一种现实主义。因此，按照翁贝尔托·埃科之建议，即使人物和事件是虚构的（并不全是），我也已努力使小说明白白讲述有关他们的故事，这是别的方式所不可能达到的。正如本书的主人公所说：如果他们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他们也会说出那个时代应该说出的话。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人物的对话是直接用时代表语言构成的，只是赋予时代语言以口语形式，时代语言是能从司法文件或其他资料中得到的。我也毫无顾忌地引用别人的文章，引用的句子只要能最忠实地给与那个时代一个总体印象。风险，当然有，但不面对风险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它会把我们引向彻底失败。

这样，我试图恢复中国苦力移民的日常生活的真相。这不只是把无名人士的生死日期、一些统计数字以及法律颁布及失效等记录下来，而是写“人”的法律史事，试图理解法律存在时的人：欲借助法律以及他们与法律的关系来描述各种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的生与死，描述他们适应艰难条件在无序中创造秩序的计策，描述他们与不同于自己文化的法律体系的执法人

员的晤见，描述他们的绝望。绝望将他们引向个人或集体行为的自杀或骚乱，即通过结束那个世界本身达到结束无法无天的社会。

劳伦斯·达雷尔说：“想象不一定非要虚构……。”“我们设想，‘别人的行为’是基于别人的感情而发生的，就像树叶萌芽于树枝。但通过从一事物推断出另一事物，能否回到过去呢？或许作家能够做到，如果他有勇气用自己的理解去填补那些将我们的行为分割开来的明显缺口，并能将其粘合在一起的话。”

在认识论范围内，采用朴素语言可能要比纯小说语言更为简练，要限制想象激情，约束过量隐喻和其他文学修辞。但是，除去这些，“纪实小说”显得异常丰盈。因为文学同艺术一样，不仅是一种痛苦，而且还是一种感知；不只是单纯的美学欣赏（尽管这很重要），还是一种认识大量真实东西的途径或方法，这些真实的东西，是用别的方式不可能得到的。